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叢書

卷之二十一

本處在戰前原有叢書之編印。其在滬刊行者已達二十餘種。三十年度起，復在後方繼續編撰。茲將已先後刊行之各書名稱及其內容略舉如下：

一、田賦徵實概論 全書四四八頁，共六十萬言

第一章 田賦徵實史的回顧

第二章 田賦徵實之理論

第三章 初期田賦改徵實物概況

第四章 現行田賦征實制度

第五章 各省田賦徵實方案概況

第六章 田賦徵實問題檢討

二、戰時物價特輯 全書二八五頁共三十五萬言

第一章 本處編製之各重要城市主要商品運售物價指

數 附十二表三圖

第二章 我國戰時物價問題之面面觀 附十一表

第三章 我國戰時中央及各都物價統制之概況

第四章 我國之物價統計 附十六表

附錄 (1) 各地物價指數彙編

(2) 抗戰四年來有關物價大事記

(3) 戰時各重要中文雜誌有關物價論文

三引

三、日本戰時經濟概況

第一編 日本戰時財政

第二編 日本戰時金融

第三編 日本戰時對外貿易

第四編 日本戰時勞工

第五編 日本戰時生鐵

第六編 日本戰時資源

第七編 日本戰時勞工

第八編 太平洋戰事爆發以來日本之戰時經濟

總本處前在滬刊行之「金融

法規彙編」編列，其得失規

二百餘項，其分類如次：

1. 健全金融類

2. 資源類

3. 金銀類

4. 通商通航類

5. 農業業類

6. 內匯類

7. 公債類

8. 小外匯類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中國紙幣發行史

全一冊 定價國幣伍拾圓正

(外埠郵費照加)

版禁
止翻
印有
所權

著者

李駿耀

駿耀

出版及發行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耀研究所

重慶川鹽銀行五樓

印刷者

竟成印刷

耀研究所

重慶上龍門浩馬鞍山三十一號

經售處

新中圖文化

耀研究所

重慶夫子進三三號

代售處

全國各

大書局

耀研究所

中國紙幣發行史序

貨幣之為用，本所以供交易之媒介，以言價值，初不繫於其質，胥視其信用以界等差。近古以為便取攜，遂倡紙幣之制。我國之行紙幣，實起於唐。追溯上古，以迄六朝，如周之里布，戰漢之以牛皮鹿皮，雖可視同信用貨券，仍涵實物易物之舊，僅輔助錢幣之流通。六朝兵戈倣興，富室商貢，競以現幣寄存寺院，行坊樞之制，其據雖兼充交易之媒介，實類今日銀行之存單，而其效用較廣。至唐憲宗元和間，發行飛錢，既可流通於京外，復行隨時兌現之制，斯蓋今日紙幣之嚆矢。宋代先有便錢，繼之有交子、會子；北宋之有交子、會子，則為不兌換之紙幣。金元及於明清，頒定鈔法，發行交鈔、寶券、寶鈔、鈔貫、寶券、寶鈔、飛錢、交子而起，惟制度日趨嚴密，察則與時興革而已。近世以來，舉世皆行紙幣，世以來，舉世皆汰減，金銀之屬，僅供準備。我國自施行法幣政策，紙幣之宏效益彰，而一班昧識宏效益彰，而一，甚且以為幣制創始外人，實同數典忘祖，賴思振集舊聞，考諸史冊，詳述以示國考諸史冊，詳述，無此豫報。本行發行局半局長駿耀，從余既久，察知所懷，以其奉職之餘，約集同志，輯成茲編，博要簡賅，法盡歸納演繹之妙，而於最近集中施行法幣之政策，尤參證事理，闡發靡遺。爰付本行經濟研究處刊行，公之於世，並鑑弁言，以資嘉勵。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秋孔祥熙序

編者自序

錢幣之形式，由古代之貝介而金銀，降及近代之紙幣，每隨社會環境而轉移；然其爲交易之媒介，握經濟之樞紐，則遍歷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而紙幣史者，不特爲客觀發行制度之記載，抑亦主觀紙幣理論之表現。故其性質重要，堪稱爲經濟史之一環。當在工商發達時代，頻繁之交易，胥賴兌換券之發行，以爲支付工具。考諸我國古代，早有紙幣之發行。而現代意義之紙幣發行，亦具數十年之歷史，政策制度，屢經更易。其演變進化，有足述者。乃出版界中除粗具片段之史實外，尚乏專書，作系統之記載。尤以一般作者，對銀行之發行實務，每乏實踐經驗，致關於發行政策隨時代遞嬗而演變之經過，未能作精確之探討。爰就平時搜集之材料，分門別類，編爲此籍。俾讀者對於我國發行之史實，得以窺其全豹。

(二)對於任苟壁行舉再舉地圖，並就各關處之探討，悉以物類立等從事。故其地圖之見解與批評。

(三)所用名詞之確鑿引用者，復得所用述流連術語，以求切於實際情形。

(四)叙述之立場，均符合地圖探討之原則。

(五)力求簡要，擴供尋覓地圖學校課程之教本。

茲與讀者所深感不忘而必須附錄於此處者，即米漢之成，得力於姚心培之圖說，以及陳繼善之圖說。在四聯圖底板行底圖上，皆助筆者搜羅材料，並據以繪成，則於稿成之時，加以批評，其益尤甚。故承許新河先生題寫此集以誌勝蹟。惜本集於卷首未收地圖之集錄，或有失於未盡其善之處。

華北印鈔發行史 目錄

華人商 廣州辦文書部

凡例

卷六

序 文書部

編者自序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二章 歷代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一節 發行之起源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二節 唐代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三節 宋代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四節 元代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五節 明代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六節 清代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七節 民國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八節 現代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九節 民國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十節 民國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十一節 民國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十二節 民國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十三節 民國之發行

卷六

序 文書部

第一章 歷代之發行

舉世無聞。歷代之發行，則其種類不勝枚舉。舉如商周之金錢，秦漢之五铢，唐宋之通寶、開元通寶，元之至治通寶，明之洪武通寶，清之康熙通寶，皆為古物。而其後之紙幣，則有宋之交子，元之大德通寶，明之永樂通寶，清之順治通寶，雖非金銀之貨幣，而其流通性質，與金銀無異。故稱之為紙幣。

第一節 發行之起源

我國具有五千年之文化，稽諸古籍，發行亦有深長之歷史。例如周禮載師篇稱「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揆厥用意，即不樹桑麻之宅，不用實物，而行使里布，作為交易之媒介。故所謂里布者，乃信用資幣之一種。以布為幣材，上印幣名，長二尺廣二寸。

俱有轉讓性質，在民間流通，分為三段，一書年月，一書錢數，一書地址，發行人於三處加蓋參印書，充作貿易貨物之憑證。
又如周禮所載：地官大司徒「掌邦布之出入」。春秋時之邦布分貨布與泉布兩種：前者係實物貨幣，後者為信用貨幣。足見成周之世，紙幣已經出現。故周代之里布，實為我國信用貨幣之滥觞。除里布之外，尚有有限度受性之轉讓軟幣，名曰便別。故周禮載「聽辨實以便別」。孫晳論便別，謂字一行，中分為二，各執其一；貴賤則合二者以為限。是則所謂貴者即到期領款之謂也。
考當時之便別，係一種借貸憑證，含有今日期票之性質。在交易完成，借貸成立時，由債務人在券之背面書字，中夾破綻為二段。債務人與債權人各執其半，而債權人之一聯，作為到期領款之憑證。便別之名，或作爲存根。前者係有轉讓性質，亦可作為支付工具。如就廣義而言，便別亦為一特種信用貨幣。

此外，在春秋戰國時代，民間交易，曾用牛皮幣作為支付工具。惟當時之牛皮幣，與今日之紙幣，迥然不同。蓋現代之紙幣，係金屬貨幣之代表，發行銀行以保持硬貨準備，為發行紙幣之先決條件。但紙幣持有人得隨時憑憑証向發行機關提領兌現。而彼時之牛皮幣，則為實物貨幣之代表。徵諸史乘，家牛為春秋時代之實物貨幣，俱有普遍承受性質。惟每屆貨遷有無之時，事前買方必須牽牛入市，始克完成交易，事後賣方尤須歸人牧牛，方可保持幣值。此項實物貨幣，買賣兩方均感不便，遂由買方用牛皮一張，替代實牛，上書買方姓名或符號，作為交易媒介。所謂牛皮幣是也。牛皮幣持有人，得隨時憑其牛皮幣，向買方掉換實牛。

故牛皮帶爲畜牛之代表，而貨牛，爲牛皮帶之準備也。茲摘引古書數段，以證明彼時皮帶之流通。孟子梁惠王章下云：「太平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帶」。國語齊語載管仲對桓公問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東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帶，以職聘歸於諸侯」。禮記月令篇仲春之月：「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帶」。

漢代帝皇以苑囿多鹿，乃收集鹿皮，充作幣材。鹿皮方尺，繩以續，爲皮幣。上印帶名久，由政府發行面四十萬流通市面，作爲交易之媒介，支付之工具。是則漢代鹿幣，亦爲一種信用貨幣。惟以幣材之數量有限，品質參差，之與貨幣同類性(Commodity)及雷充足性(Sufficiency)之原則，有所抵觸。故當時之鹿幣，因缺乏彈性，不能隨時增加，難以應付需要，致行之未久，即在市面絕跡。惟在我國紙幣史上，仍佔有相當地位，頗爲吾人所注意，未龍略而不論。東漢時用布長約一尺寬約二寸者為其目，蓋交子作貨幣，非布卽紙，有產階級；以天下不濟，一所有現錢，不易保存，大寺院僧，遂利用機會，特設一櫃，富人輒將其現錢，存入櫃中，由寺僧繪以收據，存款人可將此項存單，作為交易媒介，償債手段，存票持有人，得隨時憑此收據，向寺院換出錢財。若此項寺院存票，實屬極端，猶如以戰爭頃仍，遂將其資助，存諸寺院，以圖安全之典實，不謀而合，頗出不意。惟津浦寶貴，雖未錄用貨幣。且見此固。

宋開寶六年，太祖詔曰：「凡有錢財，不得妄置，每遇賈客，必取之以償，不得以虛無空言，妄取人財，則無以處之。」

第一節 唐代之發行

降及唐憲宗時，（紀元八〇六年）因商業發達，交易頻繁。（與波斯阿拉伯人通商，亦於此時開始）。爲便於授受攜帶，及避免途中風險起見，在各地發行，可以兌現之紙幣，名曰飛錢，亦稱便換。當時京師之各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甚至殷實富戶，均得發行飛錢。因發行機關之信用殷實，飛錢得在他處流通。惟缺乏轉讓性質，祇用一次卽行兌現。當時發行機關，既不統一，飛錢種類，因而各異。各地商人之往他處辦貨者，輒攜帶飛錢，作爲支付工具。故每於起程前，將笨重之金屬貨幣，向發行機關，掉換輕便之飛錢，隨身攜帶。至目的地時，卽向當地發行機關，掉換硬幣。嚴格言之，此種飛錢以兌現論，含有今日之匯票性質。惟對於收款機關，則事前並不指定。可以因持票人之需要而隨時變更，則含有旅行支票性質。唐趙璘在因話錄中有言：「有

詩言

第五節 宋代之發行

惟一之謂也。其事實遠在前文之後，豈不殊無以據乎。

。迨至開寶之時，恩賜有之，而錢無之，皆稱鑄錢，自非良策。且目極虛浮，謂日暮者，固當授與，頗為不便。於是有十家富戶，出資三、五萬緡，發行紙幣，名曰交子，每以替換錢文，惟財貨爭可，縱覽印券，印刷不精，易於盜損，難以顧念，故特用爲對易之規定，暫期數月，中後半載，尚可續增，不復更發。其期限未滿，又亟持還人，詣縣兌換時，亦以照覈而免耗。類於應州，順順便利，如旗幡商販之私產，毫髮不爽，類子然現，無法應付。銀鹽則既經調撥，必在途，遂不能流通，貨殖委塵起，無法解消。職是之故，寇盜呈譖，相私人，勢復參予，而嘗限轉送，備解，張君谷等，嘗交涉流通，不尋間，商業猶易，人歸行嚴止，決非所願。唯遷署，請斬殆子，願行擯，一樹歸公家。宋仁宗天聖元年（一千〇二三年）九月，在益州，許道芬主簿，專司督催，仍辦理發行事宜。時，猶俟官風方潤，並賚給資糧，以城定期限，始曉諭民衆，嚴止私鑄，外避規若，每期之最高額，得銀爲一萬五千貫，每兩內下三千四百緡。購審無隙，以財政拮据，政用急繁，仰適於二千五百緡，帶末物回前，深鑄行二千四百緡交子。於慶耶期，鑄行隨時，流通更順，後雖復總領，日益堪記，並深設交兵移，則擴大發行機構，大推廣流通範圍。每歲開耕，則民食自便，而衣糧，

蒙得壞賊之遺，可以節省開支。僅人疇損失，難堪其辱之痛。當時紙幣每至兌現，擗換之時，新舊鈔券之差額，輒逐步增加。故一殷人卡或爲紙幣兌現（名曰稱提），與常價跌落，相輔而行。蓋於稱提，表示厭惡。張端義所著東軒集內云：「今以五易一，倍於一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支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復出，又鼎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禍，小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意算捷，則必折騰矣」。

至按宋代發行鈔券之本意，不在發行代錢之紙幣，而在創造系領茶鹽之憑證。故當時鈔券，限在內地流通。蜀之交子，川之錢引，湖廣之會子，與兩淮之淮交，均爲顯著例子。惜當時學士大夫，未悉貨幣原理，祇知發行鈔券，規定期限，收回舊鈔，重發新鈔。不知鈔券本身價值，除印製費外，幾等於零。其流通普遍之關鍵，在端賴信用之維持。如對於發行數額，不加限制，而屆期覺現，又未設準備。且於每屆掉換收回，任其跌價，不予維持，則紙幣信用，勢必搖動。雖限制流通區域，延長發行期限，亦無濟挽救危機。馬端臨曰：「中興以來，轉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小，則多鑄鹽以鑄之可也。楮幣而直多，則就行都卽過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算提無策，何哉。蓋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子爲錢也。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之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於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一貫造至一百，則是明以之代見錢矣。又況以廢楮而代數斤之銅，實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末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是以馬端臨氏，以紙幣實輕用重，授受攜帶，遠勝於硬貨。其所以收換不行，稱提無策者，均爲發行分化，流通不廣所致。故主張將紙幣發行，集中於行都。以杜絕濫發之流弊，而減除稱提之手續，揆諸發行之原則，未嘗不爲對症下藥之良策。除上述交子川引與會子外，於宋太祖時，仿照唐代之飛錢，在京師設立發行局，稱曰便錢務。按當時便錢務，含有國有性質。故京師便錢務，以發行之便錢，得向諸州自由兌現。商人委錢於京師，便錢務兌換便錢，隨身攜帶，到達目的地後，隨時得向當地官立機關，請求兌現，以便交易。接當時便錢雖係軟幣，但嚴格言之，其性質與今日之紙幣，實大相懸殊也。

第四節 金代之發行

聖宋金錢深閑玉貞元。一錢比以銅爲缺乏，紙幣林有鑄之，開始發行紙幣，偏爲交易媒介。並規定其流通期限爲七年。至此項銀券之鑄，則分大小兩項。大錢分一貫、二貫、三貫五貫與七貫五種單位。小錢分一百、二百、三百、五百與一千五百種單位。鑄印造引庫以主引銷，又設交銷庫以掌書塔印合同之事，按金代發行之紙幣，實初依照宋朝先例，規定流通期限，斯滿兌場，或不換換新錢。雖對於期限之規定有變更，而期滿收回，則始終實踐。迄至章宗即位，紙幣過量改爲永久通用。將原定期限，一律廢止。此爲我國紙幣史上一大進步。同時另有一項附帶規定，凡換受長久，而文字磨滅之紙幣，得在當地官庫掉換新券。惟須證明法定之鑄錢營銷而印鑄費，先以面額計算，每貫十五文。後改以張數計算，每張先爲九文，旋改爲十二文；計文與一文。當時鈔券與硬幣，互時流通。既可節省幣林，又便價移易。惜學士大夫，未悉貨幣原理，固特未據本錢，以爲公換準備，且因軍需浩繁，不隨增撥錢庫以廢除期限，明令永久使用，不兌現紙幣之信用，因之而動搖。其結果遂使紙幣充斥，而貨溢價。朝廷有鑄，浩繁，於是於承安二年（一二九七），遣李安道責，作爲發行準備。並明令規定，凡大宗交易，悉以紙幣支付。亦至一貫以下之零星交易，則以銅錢充用。因臨鈔價跌落，而紙幣更廣，不足矣。朝廷之唯一對策，厥爲收回舊鈔，交換新錢。而新券既屬出不勝，則名稱僅反覆無常，致重辟宋朝之覆轍。是引咎自歸，歸咎于神，歸咎于志文，以資佐證。及高麗大夫爲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其貴文重過於錢，以其便於持行也。前後兵興，官出甚衆，民間始輕之，遂益耗。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六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錢法困窮，俗謂坐化。官知其然，爲更造，號曰寶券。新券初出，人皆貴之。已而復如交鈔，官又爲更造，號曰貨通。又改曰寶貨。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錢鐵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復出」。

元十二年（一二九八），五月，南歸。立襄舉臣，以資補率官。不事耕種，唯好讀書。謝文淵書辭，專事別管詩本。（唱

賦舉臣，被付第六節「元代之發行」。林有鑄之，更此種，後又以軍事頻繁，發行過剩，致幣值跌落，不得在更鑄鈔法。將舊鈔收回，發行新券，名曰銀

票。性質則同，惟以轉換地，物價因而騰貴。有時規定新舊鈔券之比價，准許期時流通。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大宋之收回舊鈔。

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大宋之收回舊鈔。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九七）發行至元寶鈔。並規定與中統錢一與五之比價，准其同時流通。武宗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又發行至大銀鈔，並規定與至元寶鈔一與五之比價，准其同時流通。迨至至正十二年（一二五〇），又發行至正交鈔，廢除中統鈔。元代鈔法之成覆無常，於此可見一斑。

發行之機構

元代之發行，依照宋金成規，採行政府發行制。當時發行機構，分鈔券提舉司，與平準行用庫兩種。按鈔券提舉司，始於徽宗二年（一一五三），即在鈔券流通之主要地點，悉依照鈔法，設立提舉司，專司鈔券之印製發行與調撥。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在江南四省先後設立提舉司，主持發行事宜。平準行庫，即發行準備之保管機構，專事保管鈔本，（即

英王所定發行鈔券之本鈔，作爲兌現之用者）。

元鈔之種類

元代之鈔券，就歷史性而分類，計有交鈔、中統元寶鈔、至元寶鈔、至大銀鈔，與至正交鈔等種。顧名思義，即

知當時鈔券，悉依歷代帝王之年號算名，含有一種歷史性質。就一般情形而論，每於新鈔發行之時，先將舊鈔收回停止流通，然因規定新舊鈔之比價，如准其同時流通，似僅以一二種為限。就鈔券單位而言，世祖發行之中統鈔，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三百文五兩五錢等種，而惟在至元時代，曾一度發行輕鈔券，分二文三文與五文三種。旋因搜括不便，遂於三

年後廢止。

以詳算單位而言，又分銀錢與銅錢一種。前者以銅錢為計算單位，故中統錢為銀錢，兌現時，亦以銅錢為支付手段。至

大德錢，則以銀兩為計算單位，兌現時，亦以銀兩為支付手段。

其

其

其

其

其

發行之方法

元代帝王雖據行銅鑄不造錢方，相繼頒佈錢法（即鑄行條例），規定性質單位，以

銀錢本錢額，曉諭臣民樂於承奉，不妄指揮。此其一。

據錢本

由平准行用庫保管，按錢存存在庫，僅錢券兌現之條件，

不致損失。

當時錢券

之手續，頗有現代推

行紙幣之意味。此其四。

禁用確貨，推行鈔券。由法律規定，凡應以錢支付者，悉以鈔券抵充。此其五。

延長鈔券行使期限，不

立年月，永久通用。使持券人，願保持鈔券，惟以保藏價值之手段。此其六。

擴大行使範圍，當時紙幣，通用於各路，既然各地

通用，鈔券用逾百處。此其七。

規定比價，維持價值，分銀錢舊鈔之比價，古銅錢銀兩之比價，三種，至一千四百

至大通寶，一文等於至大銀鈔一厘，大元通寶一文，等於至大通寶十文，至大銀鈔一兩，等於至元寶鈔五貫，亦等於中統鈔二十五貫。規定比價之目的，亦在推行鉛貨，與維持幣值。此其八。世祖中統與武宗至大年間，先後禁止民間買賣金銀，使人民所存金銀，送至各地平通行用庫，掉換鈔貨。既可加強鈔本，又得推行鈔貨，誠為當時之良策。此其九。綜上九點，元代鈔貨，深得盛行之要旨，自然推行無阻矣。

私製之處分 元代財政拮据，頗賴發行鈔券為挹注。故當時帝王曉諭人民，以紙幣發行為政府之專權，人民不得濫用。對於偽造私製者，予以嚴重處分。再如雲南人氏，行使非本土所產之貝子，作為鈔貨者，亦與偽造行便同罪。可見元代帝王，對於邊區人民行使之通貨，亦有嚴格之限制。雖因習用貝子，不便即用元鈔，但以限制貝子性質之手段，期達推行元鈔之目的。

第六節 明代之發行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興滅絕種，剪除奸黨，國事日安，其運量，日高其財富。至永樂十四年，國庫之貯，流歸空國，俗稱交易媒介，支付工具。旋因幣材缺乏，鑄錢維艱，而民多棄之，日趨繁榮，貨物數量，日有增加。通貨供求，不能適應。奸民遂乘機盜鑄，擾亂幣制。貨幣種類，因而極雜。價值之不統一，貨幣亦難鑑別，人民損失，自難免。貨幣率重之格，逐漸定律。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七五）三年，為減輕百姓負擔，裁免課賦，遂實地減輕。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增設戶部，專司財務。當時財務浩繁，歲入增加，為易管理，簡易迅速之籌款方法，尋知增發鈔券。惟發行一經過度，即形成鈔輕錢重。雖經政策嚴禁防範，則紙幣定律之實現。迨此項鈔券泛至相當程度時，祇得採用捨棄之策，發行新券掉換舊券。又與戶部合署，並立戶庫，為本充作發行準備，與兌換基金。並設立專官，以發行鈔貨，保管鈔本，掉換鈔券為其職掌。

明初鈔之種類 明代鈔券之種類，依循宋朝例，行政政府發行制。當時布丁在各路設立平準官田庫，為本充作發行準備，與兌

鈔以帶持財政，而所有鈔貨，悉以太明寶鈔命名。關於此點，未始非我國鈔券史之一大通考。當時鑄銅錢，與銅錢相輔而行，同時發通。鈔券一貫，等於銅錢一千文，其目的，在維持鈔貨之流通，使之普遍流通。

維持之方法 大明寶鈔之最大缺點，厥為發行過度以致鈔輕錢重。保持鈔券，既有嚴密規範，並刻畫無誤為要務，儘量保持種幣。當時帝王以財用孔急，必須特鑄新鈔貨為挹注。同時鑄於幣值之跌落，推行之困難，不得不頒布鈔法。一方面擬定鈔本，規定比價，另方面收兌破損鈔券，限制銅錢行使，以擴大鈔券之用途。同時禁止金銀錢物之交易，作祟推行大明寶鈔之手段。故於洪武八年頒佈鈔法，規定鈔券價值，及其與銅錢金銀之互換。鈔券其分六種，即銀二兩、銀一兩、銀半兩、或白銀一兩，而銀券四貫，則等於黃金兩錢，至貫銀，一千文，銀二兩，等於米一百石。同時頒布鈔法，即收兌鈔券條例。甫開鑄鈔定義，規定收兌條件。銅錢行使，限於一百文以下之零星交易。整數交易見悉以鈔貨支付。自此之後，編綱稅，廢除大明寶鈔編綱，並採納都御史陳瑛之建議，頒佈戶口食鹽法，實施食鹽官賣制度，令天下富民計口徵賦食鹽。當時每戶每年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其目的不外擴大鈔券用途，減少其數量，抬高其價格。仁宗時代之征收店稅，宣宗年間之設立鹽關，與憲宗之祿米折鈔，均為擴大鈔券用途之明證。洪武八年，二十七年，與宣德四年，先後禁止人民買賣金銀。一面限制金銀用途，一面擴大鈔券流通。於是民間金銀，悉送於官，掉換鈔券矣。再如洪武二十七年，以鈔貨跌價，銅錢升水，曾一度命令戶部收回銅錢，禁止研貨行使，亦推行明鈔之法。貢士，不可謂用正統，固以別稱耳。一貫文一千貫，則銀計元錢六百枚。

洪武八年頒佈之收兌破鈔條例，即倒鈔法，責成各路行用庫，收回破鈔，掉換新鈔，以維護平價，而鞏固幣信。所有文字不滿紙張，破爛而不堪行使之二呂，即「倒鈔」，悉數調換，旋因掉換日繁，遂限制兌換範圍，擴大破鈔用途。票面文字分明之鈔券，無須換算，一律通用。且破鈔須積至貫百，始准兌換。同時規定上項破鈔，可充完納商稅之手段，收稅機關，對於破爛油污水漬鈔券，一切破壞，悉數收受，不予留難，以補收兌機關之不足。

發行之限制，官宗號於鈔輕錢重，鈔本加厲，聽其自然，決非所宜。遂限制發行額，作為釜底抽薪之對策，新券印造，即予停止。庫存新券，予以封存。破爛舊鈔，悉數銷毀。並設立鈔關，獎勵以鈔納稅，促進鈔券回籠。自此以後，流通之弊，日一減縮，實鈔信用，始因而更固。

自處罰之規定。洪武八年頒布倒鈔法，設立行用庫，兌換破鈔。如有商人，因賣鈔破爛，故意抬高物價者，亦應予以嚴重處分。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以寶鈔跌價，銅錢升水，命令戶部將市面流通之銅錢，限於半個月內，悉數收回。同時禁止硬貨流通。民間所有銅錢，悉數歸官，掉換寶鈔。如有私自行使，或故意鑄造者，即以違法論罪。再如洪武八年至二十七年與宣德四年，先後曉諭民衆，禁止買賣布帛金銀。以集中金銀，而推行鈔貨。違者行罪。告發者，則將其財物，全數作爲獎勵金，惟須以寶鈔折價支付。

第七節 清代之發行

一、發行之政策。清代帝王鑒於前明發行過濫，影響繁庶，致遭厄運，故主張採行現貨政策。對於鈔券之發行視爲畏途。順治八年，始發行鈔貫，以制錢爲計算單位。惟其發行額，以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爲限。且流通十年以後，即悉數收回。再如康熙年間，有學士蔡之定奏請頒行鈔法，康熙未蒙採納，反受嚴重處分。清代帝王對鈔券發行所持之態度，於此可見一斑。使民間授受，悉以硬幣支付。

二、發行之目的。清代發行紙幣，俱有二種目的，茲略述於後。

（一）支持財政。據皇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鈔幣一載「順治初年經費未定，貫與錢兼行。」咸豐三年太平天國事起，清庭軍用浩大，財政匱乏，即使幣材充足，亦屬緩不濟急。於鈔券之發行，當時祇求於鈔券之發行，當時祇求增加。

（二）挽回利權。自鴉片戰爭失敗後，締結南京條約，我國即開放商埠，紛紛來華經營商業，國際貿易俱有長足進展。英國商人爲擴充商業勢力範圍，往華先後設立麥加利與以謀利潤之增加。彼時以謀利潤之增加。彼時之中，當局以未悉審核權之外溢，有損於國民經濟，任其自由發行，不如過關。而一般商民則以爲外商銀行，資本雄厚，信用殷實，對於其允許，樂於承受。於是國人倡議組設華商銀行，其主要者，爲光緒五十三年所設立之中國通商銀行。光緒二年創辦於上海。

江蘇票銀行，與三十四年設立之西明銀行，三十二年官商合辦之齊東銀行，與三十三年督辦淮海錢銀行。此等銀行仿照外商銀行先例，發行兌換券，以挽回權利，便利商業。尙時於各省設立督辦局，興官銀號之銀行銀票錢票。惟其流通區域，以各行省為限。綜上所述，可知咸豐年間之發行，乃以財政為目的。至光緒時代之銀行，則以經濟為目的。以清開文印紙，即為發行之機關。清代之發行機構，除外商銀行外，分官行、商辦與官商合辦三種。順治年間之鑄錢，雖康熙時代之審票鑄錢，應由官家發給成本銀兩，責成戶部或國寶指定機構發行。中國通商銀行與匯業與四庫台發行銀票，則由商民集資組織，含有商辦性質。唯官部銀行與交通銀行則由官商雙方集款組織，含有官商合辦性質。但其後又由官商合辦，如義興、義興錢莊、義興錢行、通寶、當利源等。

鈔券之種類：清代鈔券，就性質而言，分錢票銀票銅元票（銀元東國種）錢票亦稱貴陽錢票每張一角錢二半宋文（或其倍數），銀票亦名官票，以銀兩計算，則收各地銀兩之價值不一。銀票流通，自然限於發行省份。清代末葉，以生活程度而高，制錢單位極低。故發行銅元票，以補錢票之不足。而銅元票，以銅元計算，錢票銀票與銅元票則泰半由官銀錢號發行。而

銀元票，則以銀元計算，在清代末葉，兩銀行發行，又多題「國寶」。清光緒十二年，擬定錢票之數額，擬用可見一斑。專以銀元票為主，則其後之困難，清代帝王之發行政策，認為紙幣不易限制數量，維持幣值。故並張採用硬貨，非至萬不得已，特決不發行紙幣。順治八年雖一度發行為重，而流通八年，即行收回。在嘉慶十九年時，才見紙幣之流通，及歷年間之不一弊端。當時朝廷對於紙幣發行，既不提倡，自然難以普遍，此其一。我國人民，行使硬貨，已成習慣。其交易媒介，支付工具，與夫蓄藏價值之手段，悉採硬幣方式。如歷朝通行之紙幣，偶有貶值之痛苦經驗，致一般人民，對於紙幣，發生不良印象，此其二。咸豐年間發行之官票寶鈔，既由國庫發行，政府理應積極提倡，以資推進，而反規定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與夫其他一切租稅，均以五成紙幣為限。甚至地方長官有時竟拒絕收受紙幣，作為完糧納稅之手段。使濫發紙幣，缺乏準備無力兌現與不易收回之種種弱點畢露無遺。其幣信虧摺，不言而喻。於是人民對於保持紙幣，視為畏途，此其三。官銀錢號之錢票銀票，含有地方法質，其流通區域，以本號與分號所在地為限。此其四。清代末葉，官銀錢號，與新式銀行之發行，被視為相對的，督辦因難，為其勢力所制，其貶值。其發行準備，未經法律規定，而被發行機關所漠視，以致不兌現紙幣之發行，督辦為相對的，督辦因難，為其勢力所制，其貶值。

自然結果，此其五。咸豐年間之紙幣雖並未保持現金準備，致不得兌換現金，惟當時之官吏則可以自由兌換，並無此項

卷之三

卷一百一十一

第二章 官職變遷之聲音